

◀ (上接10版)

公,一时前往存款及开立往来户名者纷至沓来,总计全日营业共达四百余万元。

新的行屋大楼启用后,中汇银行的业务得到全面扩充,储蓄部、地产部、商业部、证券部、保管库一应俱全,功能齐备。杜月笙在1934年9月28日的《申报》增刊上发表文章写道:

本行崛起于上海银行业之最蓬勃之时代,以其时考之,则至矣,但外丁世界之不景气,内则兵戈不息,水旱瘟疫纷至沓来,农村崩溃,工业基础动摇,国际贸易之入超有加无已,银底逐渐减少,凡百事业皆感受极度威胁,银行何能超然独荣?而新兴之势力如吾本行者,所受时代之试验与潮流之冲刷,更甚于一般,并存于今日社会者,卒赖同人协力经营,营业发展与日俱进,存款利率力求克己,放款则惟稳健是尚,不及五年,资本扩充至实收二百万元,公积金逐年增加,已超过三十万元,全部资产合计有一千三百余万元,非社会之信赖有加何以至此。……今者新厦落成,银行之基石愈固,此后营业范围愈广,与社会接触之机会愈多,本行同人所负之职责愈重,应如鼍勉将事,使内部组织技术科学化,使营业方针社会化普遍化,并造成服务本行者以学术相尚之风气,藉应社会迫切之需求。

中汇银行大楼的营建,既

是银行业务开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当时银行业发展潮流。1929-1931年,大量流入上海的白银提高了房地产的价格,也扩大了上海银行业的地产信贷。在1926-1930年的5年之内,上海房地产的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其中1930年就增长了10亿两之多。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在上世纪20年代末变得尤为活跃。1930年3-12月十个月内上海的地产交易达到6000多万两,1931年全年的交易量高达一亿三千万两。虽然我们无法具体测算出中资银行业对地产的投资情况,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相关的记载中看出中资银行业对地产的投资亦是相当活跃的。中资银行对地产的投资除了营业用房地产和经营性房地产之外,同时还进行房地产的贷款和抵押。正如章乃器所说,“普通商业银行往往是逃不出地产和证券的投资,放款的抵押品、投资的标的物、钞票的保证准备,除了公债,就是道契”,“许多银行纷纷扩建行屋,兴筑大楼。上海的一些主要建筑,如四行储蓄会大楼、大陆商场、国华银行大楼、垦业银行大楼、上海银行大楼、广东银行大楼、中汇银行大楼和中国通商大厦均在这一时期建成”。

大楼建成之后,董事长杜月笙兼任总经理,直到1946年才由刚刚卸任上海特别市财政局局长一职的浦拯东继任总经理。中汇银行的业务开

展颇有声色。1936年11月2日,将江浙银行合并进来,成立中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多亚路中汇银行改为总行,天津路30号江浙银行原址改为中汇银行分行,魏晋三任分行经理。

银行资本总额合并为350万元,业务范围仍包括存款、储蓄、证券、地产、保证等类,而对于储蓄业务,尤为注意,将设立储蓄专部,另拨基金,会计独立,以资扩展。由杜月笙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吴启鼎、周文瑞、钱新之、张法尧等为常务董事。

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中汇银行南京分行正式开业,行址选在了银行聚集的南京市中山东路一带,潘树藩任南京分行行长。

### 从银行大楼到博物馆——历史的选择

上海解放后,1950年初,中汇银行就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公私合营的请求,这一请求被接受,并由华东区行与中汇银行议定具体办法。但因为中汇银行的董事、监察分散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意见不同,难以达成一致。随着业务开展无法维持,亏耗日益加大,赤字不断增加,中汇银行“以无法轧平账面不能参加(合营),遇有头寸短缺,亦将分文无处拆借,实已至随时有倒闭的危险”。

据上海档案馆档案“拟参加公私合营银行沥陈接洽经过请讨论案”:

经过若干波折,厚蒙人行特别照顾,商定将人事、业务合并于公司合营银行,赤字、呆账及原借之23亿,合共40亿,由公私合营银行如数予以垫借,一切资产仍为原来股东所有。电由港方举行董监联席会议,议决照办,并取得在沪董监同意。随后于1951年12月2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用投票方式表决,全体一致通过,此为参加合营之第一步。同时股东会推进心雅与陈朵如、徐寄庾两常委为清算人……先与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签订协议书,将人事与业务自1952年1月1日起并入公私合营银行。同时成立清理处,依据协议,清理存放汇以外之一切资产负债事宜,以迄于今。

1950年代初,中汇银行的资产中最值钱的就是中汇银行大楼,但在当时情况下除了政府机关外,难以觅到其他租户,所谓租金多为空谈,要清偿高达六七十亿的债务,除了



1959年,上海博物馆迁入中汇大楼的手绘陈列方案



1979年中汇大楼馆舍底层北展厅中陈列的突尼斯文物展

处理大楼之外,似乎也别无办法。1951年12月31日,中汇银行以原有的存放汇业务合并于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并自1952年1月1日起成立清理处,清理中汇银行自身的资产与负债。

根据上海博物馆档案资料,在1958年下半年,上海市就决定调拨中汇银行大楼给上海博物馆使用,作为上海博物馆新的馆舍。此前,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两家单位都在南京西路的跑马会大楼内。随着两家单位的业务开展和人员增加,场地明显捉襟见肘。而此时,新中国的文物博物馆事业和图书馆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阶段。从1953年到1958年止,上海市文管会接收、受赠、收购以及代管的珍贵历史文物就有25800多件,从废铜中抢救出来的文物就有13700多件。1958年征集到的文物总数比1953年增加了12倍。市领导一度打算将上海展览中心的西翼建筑作为上海博物馆馆舍,最后因为诸多原因还是选择了中汇银行大楼。当时也正逢1950年代末那波博物馆等文化场馆建设的高潮,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一些重要的文化场馆都在此时完成建设。上海博物馆馆舍易址也是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而筹划的。

中汇银行大楼原是为作为

银行和写字间大楼来设计建造的,要改作博物馆,其难度可想而知。据费钦生在《六十年陈列艺术之路》中的回忆,这幢大楼的主立面东西向平侧窗采光是最犯博物馆展示忌讳的。上海博物馆先派展览陈列的专业人员查阅核对中汇大楼的原始建筑图纸和最后的竣工图、暖通给排水图,并对建筑做了现场校核,根据博物馆业务需要重新规划了博物馆各部门用房的空间布局、面积分配和工作流程,绘制了展厅、陈列室等房间的室内装修效果图,历经3个月提出了具有安全系数、切实可行的改建方案,然后委托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进行改建设计,而改建工程则委托了当时的卢湾区房屋修建公司和黄浦区房屋修建公司共同承担。但是改建工程直到1959年七八月份还没有完成,甚至在这时底层铺面里的有关单位还未能解决搬迁问题。后来,由上海市商业一局、房调会、文化局等几家单位多方协调才限期解决。改建工程也被限定在当年8月25日之前必须完成。

因为时间太紧,来不及对原有建筑大修大改,更重要的是当时对保护中汇大楼的现状有明确要求,所以上海博物馆方面其实并未对大楼进行太大的改动,只是将各层写字

(下转12版) ▶



1960年代中汇大楼馆舍中的中国青铜器陈列室



中汇大楼馆舍底层北展厅手绘陈列方案